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南溪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南溪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编

目 录

一、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	孙炳文著	(1)
二、下莲池喋血记	张仲翔	(5)
三、共产党在南溪的第一个支部	包楷文	(9)
四、南溪最早的地下党组织活动	熊大猷	(12)
五、关于39—40年地下党南溪特 支情况简介	陈子轩	(17)
六、一九三九年南溪地下党情况简介	彭雨村	(19)
七、抗日时期南溪地下党一个小组的 活动情况	吴耀邦	(22)
八、47—49年牟坪一带的地下党情况	陈子卿	(26)
九、南溪农民协会组织和暴动的回忆	张次伦	(29)
十、南溪县农民协会的成立	熊大猷	(39)
十一、回忆我在南溪农暴的前后	陈相清	(43)
十二、绥庆一带农协的组织发展	陈子卿	(48)
十三、我对李庄农民协会的片段回忆	罗叔谐	(52)
十四、洪默深革命史事概述	蔡香麟、杨树清、洪少阳	(59)
十五、张云龙烈士小传	张君甫	(66)
十六、解放前南溪人民遭受灾难简况	廖彬儒	(70)
十七、青帮在南溪	包楷文	(75)

十八、国民党统治时期南溪的地方武装

周荣瑜、廖彬儒 (86)

十九、四十年代前后南溪的财政金融 郭仲和 (98)

关于第一辑内容的补充和订正

继续征稿启事

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

孙炳文 遗著

（原著在民国十六年一月一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的新年特刊）

一九二六年的中国民族运动，无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或世界革命的立场上，都有很大的价值，无论世界革命的民众，或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都十分注目。因为中国的民族运动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尤其是—九二六年更为重大。

促进中国民族运动暴发的导火线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大屠杀，并株连广州、九江、青岛、天津各处。从这几次大屠杀后，中国的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遂普及全国。尤其是省港工人的罢工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之扩大，奋斗之毅力，更给帝国主义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五卅后，中国的民族运动固然加速度的激进，但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动派的进攻政策也更进一步了。当郭松龄倒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出兵满州，侵犯中国领土，拯救其垂死的走狗张作霖，结果使反奉运动不能胜利。在去年三月间，英、日两帝国主义复造成张、吴的联合战线，以扑灭带有民族革命性的国民军，并唆使段祺瑞惨杀反

抗英日联合的哀的美敦书的请愿群众，演成比“五卅”更凶的“三、一八”流血案。反奉运动遂根本失败，北方革命的高潮被压得无声无响。我们须知道帝国主义这一种进攻政策是很有步骤的，很灵巧而且残酷的。一面运用直接的武力，与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以巩固反动势力；另一方面，雇佣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许多反动份子等做“反赤宣传”的工作，以离间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使五卅运动与五卅运动的变相——反奉运动终至失败。

可是，五卅运动与反奉运动虽然失败，而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却日益巩固，省港工人的反英罢工仍然坚持，国民军的力量仍然存在。全国革命的民众正找寻新的出路，计划更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北方的局面虽在反动的军阀统治之下，革命的高潮被强压下去，而南方的革命空气却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虽然达到了驱逐国民革命军，镇压北方民族革命运动的目的。然而这不过是其进攻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计划之一部份的成功。至其整个的总计划是完全消灭了所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也就是消灭其所谓“北赤”与“南赤”，所以在国民军出北京以后，便进行总攻广东国民政府的计划。在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决然于七月间出师北伐，一面阻止反动军阀南侵，一面发展革命的势力。当此革命的军队与反革命的军队对抗的时候，頗有人不相信北伐军能胜利的，因为北伐军的数量少，器械军饷又不十分充足，在反动的所谓“反赤军”方面，军队的数量既数倍于北伐军，而枪械军饷亦较精良，更有帝国主义种种政治与经济上的援助。然而结果北伐军却根本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势力，占领全国中心的武汉，使英帝国主义在长江一带获得的利益发生动摇。虽然印度班的英帝国主

义在广州、汕头、万县各地，运用其已不适用的炮舰政策，施行其更凶恶的白色恐怖，但终不能阻碍北伐军的军事行动，扑灭民族革命运动的势力。因此反激成全国民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增加主观上的革命必须条件，这是我们应该感谢大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呀！北伐军攻下武汉及南昌、九江以后，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扩张到全国版图之一半，此种民主革命势力的集中与全国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形成两个很大的对垒，但是我们须知道这次军事能得到迅速的胜利，是有以下两个重要的主观上与客观上的条件：

(一)欧洲资本帝国主义虽然在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克服了大战以后的经济恐慌，得到相对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本身仍含着很大的许多的矛盾——例如生产过剩与市场缩小的矛盾。至一九二五年这种相对的暂时的稳定便露出破绽，到一九二六年更根本破坏。英国四百万工人的空前总罢工。法国佛郎的跌价与财政的纷乱。德国、波兰与意大利的经济恐慌，这种现象，足证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稳定已不能保持。同时各国的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发生大动摇，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在这种客观环境之中，得能扩张社会革命的势力。另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日趋稳固，可有许多的力量来领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众及所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齐向帝国主义进攻。

(二)中国的民众虽受了“五卅运动”，“反奉运动”几度失败的打击，然而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之中，实际上正是锻炼民众的革命经验，扩张更伟大的民众势力，全国工人运动之统一，数量上与质量上的增高。广东、河南、山东、湖南各省的农民组织的激进，武装的反抗军阀、土匪、逆党、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城市的商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亦起来参

加革命，更有许多革命的学生，或去指挥民众运动，或投身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中，使革命的军队有了新的生命。

在以上两种主要的条件之下，所以北伐军能于最短的时期取得胜利，但是我们又要晓得，中国民主革命的势力虽已激进，而阻碍民主政治建设的障碍还不少。

(一)英、日及其他帝国主义正在极力的扶植奉系军阀，准备向革命及一切民众进攻。虽则他们中间各有各的目的，但始终要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破坏中国民主革命政治建设，则为其共同的目的。

(二)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半封建的势力——大地主、土匪、民团、土豪劣绅仍然很大，宗法社会的制度仍很稳固的存在着。

(三)混迹在政府机关的贪官污吏，尚未铲除净尽，这种贪官污吏的存在，不但使国民政府发生政治上的矛盾——政纲与实施不合，且因此会使政府失掉民众的信仰与拥护，反动派可以因此乘机进攻。

以上几种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现在是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的同志们及民众们对于这种障碍，当然要尽其力量来征服，而且我们的党已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方案。

下莲池喋血记

回忆成都“二·一六”惨案

张仲翔

一九二七年春，成都三大①尚未合并时，成都大学与成都师范大学同在旧皇城内。旧皇城为明太祖第十一子朱椿封蜀王的宫殿，蜀王朱椿与明成祖燕王棣为同母弟兄，成祖即位后，蜀王始赴川就国。蜀王宫殿与北京皇宫相同，不过规模小于北京皇宫。当四川三大未合并前，成大与师大同住皇城内。

“二·一六”惨案发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晨，共牺牲青年十四人，成都大学就有六人：

- 一、李正恩，四川渠县人，成都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年二十三岁，未婚。
- 二、钱芳祥，四川重庆市人，成都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年二十三岁，未婚。
- 三、王道文，四川渠县人，成都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年二十四岁，已婚，有一子仅一岁。
- 四、胡景瑗，四川南充人，成都大学政治系一年级的学生，年二十岁，未婚。
- 五、王向忠，四川高县人，成都大学预文科二年级的学

生，年二十一岁，未婚。

六、韩钟霖，四川宜宾市人，成都大学预理科二年级的学生，年十九岁，未婚。

当时，成都大学为六年毕业，前两年分文、理科，不分系。那时，党为李立三当权，动辄讲城市暴动。成大校长为张澜先生，字表方。学生中分为三派：一为共产党，以社会科学研究社为代表；二为国民党，以健行社为代表；三为国家主义派（即后之青年党）以褐社为代表。

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作大学校长，有蔡元培先生作风，实则比蔡先生更偏向共产党。当时因为“立三路线”的影响，一般党员同学都较为偏急。“二·一六”惨案之所以发生，实则以打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杨廷铨为导火线。杨廷铨是犍为县人，原为成都大学训导员，亦为国民党健行社成员，以靠近二十四军，谋得省一中校长。省一中学生由于有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在该校兼课，学生受到共产主义熏陶，进步者多。杨廷铨发表省一中校长后，一中学生即通电反对，不许杨到校接事。杨取得二十四军支持，带兵入校，武装接事。学生当时隐忍未动。待杨接事后，以为学生慑服，戒备稍松，学生即将杨打死，将尸首丢入井中。当时成都驻有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个军长，成立了所谓三军联合办事处与军警团。打死杨廷铨，马上成为“二·一六”惨案的导火线。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正当寒假已满，各校行将开学时，反动军人发动流血的“二·一六”惨案。事前留校师生毫无所知。惨案发生的头一天，寒假留校同学有好几十人。社会科学研究社同学如李正恩、王向忠、韩钟霖等皆留校未回家。他们偕其他同学约十余人，一同在校后煤山上放风筝，

嬉笑欢乐，谁知第二天就惨遭屠杀。宜宾同学们寒假返家时，王向忠送至东门望江楼，并口吟一律相送：

暂离何必强成诗？ 万种情怀君自知。
南浦我来初送别， 东风人约再来时。
魑魅搏人应见惯， 狐鼠欺凌好护持。
他日煤山高处望， 白云缥渺共相思！

谁知“东风人约再来时”。就只能见到他们鲜血淋漓，陈尸至公堂上了。

事后刽子手们还假作慈悲之态，对人说是他们选定在“二·一六”，因为在寒假期中，希望能少死些人。

当“二·一六”清晨，他们几十人一同从被窝中叫起来，绳捆索绑送到军警团去时，刽子手向育仁（三军联合办事处处长）正陪吕超参军长打麻将牌，这是他们做好的圈套。明知吕参军长为宜宾人，怕他阻止，故意由向育仁约他打牌。当他知道后，恰值宜宾留省同乡们为此事来找他设法营救。吕参军长马上放下牌就要过问，向育仁留住他说：“忙什么？刚才捕去，还须审问，不忙，不忙！”估留下吕参军长打完四圈走。到四圈未完，已经人声鼎沸，枪声响了，十位革命青年已经倒卧下莲池畔血泊中了！

成大牺牲的以上六人，当天由张校长命人抬回停放“至公堂”上。第二天，我偕王震仙同学去至公堂看望，只见鲜血淋漓的六具尸体，五人头部已经破碎，认不清面目了，只有王向忠还剩下半边脸，睁着愤恨的右眼。校长张表方先生、教务长吴君毅先生及其他教授同学等，齐集至公堂看着为革命牺牲的六位同学用白绸裹的尸体，师生皆痛哭流涕，悲愤不已。老校长长发飘飘，老泪纵横！

第二天，在至公堂上为牺牲的六位同学开简单追悼会。

至公堂上只听见一片哭声。会后，校长命葬之于南郊外武侯祠侧，坟成六角形，取“雪花飞六出”之意，同学们经常去凭吊。解放后，听说与“十二桥”牺牲烈士，共同改葬于烈士陵园。恨未能亲自瞻仰。今天我也行将就木，愧对先烈，惭恨何如！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写

注解：①三大，当时指的是办在成都的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和原四川大学。

党在南溪的第一个支部

包 楷 文

我现在才六十岁，怎么会知道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一个支部在南溪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说起来似乎不大可能。其实我并不是亲身参与，而是耳闻及少部的目睹。不过材料是真实的，来源是可靠的，当然，不一定很全面，也可能有出入，还有待于更多的史实来证验。

我的二哥包析城(柱文)，就是党在南溪的第一个支部的一个党员，从成立时起，直到农民暴动止，他一直都是参预者。在抗战初期，他对我进行了不少的有关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给我一些早期的有关党的马列主义的书刊阅读，夜深灯下，向我讲了许多南溪党组织领导农协暴动的情况和人物。现在通过我的回忆和整理，写出如下的资料，供研究和整理我县党史者参考。

远在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学堂当校长和肖楚女在该校教书时，由于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川南师范就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在四川来说，也是最早的一个支部。在这个支部的党员中的南溪人有：李立之、包灿文、张大经、包析城、周伯尧、张松筠等几个人。在一九二六年间，这几个人先后从川南师范毕业回来，即建立起“南溪支部”，书记李立之，组干包析城，宣干先是包灿文，不久改周伯尧。这个支部的领导机关是“川南师范总支”，支部下分三个组，李

立之、包灿文在南溪高等小学教书，是一个小组；包忻城、周伯尧在第一国民学校教书和张松筠三人是一个小组；张大经是李庄人，在李庄教书，所以由他一人在李庄设法发展建立小组。正式成立党支部大会是在李立之家中。以后开会碰头等在第一国民学校（奎峰书院，今城关粮站一入市）和我的家中（四牌楼侧）的时间较多。不久，张质夫、郭士光等人先后回南溪参加了这个支部，包昭明入党也在这个支部，组干由包忻城改为张质夫，支部开会有时也在张质夫家中（凤翔门与星都门之间的城墙边）。至于团、农协及其他群众性的集会，就不在这些地方，而是在上党部①（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县党部）或另外什么地方了。

一九二七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向地下，因此，南溪党的内部活动也就转入地下活动了。开会、抄印文件、保存文件等，便爬上了“四牌楼”（四牌楼是俗称，本名“奎星阁”，在今南溪旅馆门口的十字街口）。四牌楼地面一层用条石拱成向东南西北的四大圆拱门，骑在这十字街口上，八面三层木质建筑，顶层当中有“魁星”塑像。常年有香火供奉。朝夕进香，每月初一、十五，还燃灯，撞钟以祝祷；负责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叫“王烙耙”，当时他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住“文武魁”（进大南门的东侧）内，他除每天早晚开阁门上去烧香换水以外，都将阁门紧锁，乃至无人能上。阁上第一层，八方都有窗壁，中有“魁星”，即使白天，有少数人在上面活动的话，街道上是不会发觉的。当时我的家就紧贴“四牌楼”的西南面，檐桷高过它的第一层的石栏杆，栏杆中的洞恰好容得下一人爬进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当时党支部的地盘也就设到“四牌楼”上了。

农民暴动前夕，南溪党组织周围还有一批既非党员也非团员而积极可靠的群众，我知道的有郭威啸、邓隘榜(雪晴)等，他们担任和李庄支部的联系、通讯，以及散发传单标语等许多工作。农协会员上街游行，在当时“下党部”^②门口，把孙子成的“南溪县商会”的大木牌抱来摔烂的，就是郭威啸。

农民暴动失败了，党员、团员们风流云散，“四牌楼”顶上还暗藏了一小部份当年的文件和书籍，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国民党县长李凌霄为了敲大地主熊镜成的竹杠，诬害他是共产党员，捕在监内镣铐起来，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包析城怕弄到他的头上来，才把这些文件暗中取回烧在我家的灶膛里。不过也还剩了几本书，有列宁的，也有布哈林、陈独秀、李大钊的，以后给了我。一九五一年，我连一些存书交到南溪文化馆去了。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注释：①上党部是指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党部，当时设在上文昌宫内（现前进小学地址），因在上半城，人都称作上党部。

②下党部是一批国民党右派自行分设的党部，地点在下街的火神庙，故当时叫它下党部。

中 国 共 产 党

南溪最早的地下党组织活动

熊 大 獾

水有源头树有根，共产党在南溪县有活动，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因县人李立之、包析城、周伯尧等早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肄业时，校长恽代英、教师肖楚女在校中地下活动，发展组织，于是李立之、包析城、周伯尧在他们的培植下参加了党。二五年，立之等人先后回县，在县立小学任教，就开始从事党的活动。随后张守恒（入党）从北京读书回来，有党的介绍信，遂同立之共同活动，吸收了校长郭椿（郭士光）及文化界的张质夫、叶幼斐、胡烈辉、董少华、吴雨文、张厚诚、张仲权等人参加，于是成立了一个支部，李立之为书记。当时的活动，只限于在城内的知识界和学生中开展，还未深入到农村中去。到了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事件后，重庆中法大学被迫停办。南溪在该校的学生参加了党组织的有：廖时勉、胡明鑫、熊大猷、胡明宗、曾庆铁、周小如、罗尉芬等，辍学回县，加入组织，这时人数增加，于是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活动。

1. 组织“左社”为党的外围团体。当时国共分裂，以此组织来联络国民党中的左派，以抵制蒋介石的右党势力。

2. 利用城乡豪绅与农民的矛盾，顺利开展党的农运活

动。南溪县的政权，历来大半是城绅把持，乡绅不能染指，因此城乡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党就利用这个矛盾，从中进行活动。

3. 抓教育阵地。当时县小校长郭椿，已被吸收入党，教师中强半是党人，于是积极主张新创南溪县初级中学，组织城绅联名请委郭椿为校长。开办了中一班后一年，校长职务由进步人士吴小波兼任。一九二七年秋，又抓得牟坪小学，以党人胡恺如为校长，留宾场小学是胡烈辉作了校长，李庄抓得张祖仲，他虽非党人，而是进步人士，其他如仙霞、宋家等学校，虽未抓得校长职权，亦利用社会手腕，安排党人进去当教师。这样就抓了几个学校作为党活动的基地。

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两年之间，由于党人积极活动，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经中共四川省委刘懋安的指示，要抓紧时机，迅速组织中共南溪县委，并指定李立之为县委书记，廖时勉为县团委书记。当时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中，要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非常困难的。经支部多次地反复研究和讨论，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晚间，在县城伞匠街李立之家中成立了南溪县党、团委员会。李立之为书记，张守恒、张质夫、包析媛为执行委员，廖时勉为团的书记、胡明鑫、熊大猷为执行委员，并传达上级秘密规定，以英文字母的C、P二字代号党，C、G二字代号团；中文用“大学”二字代号党，“中学”二字代号团。南溪县的组织，决定以“朗斋”二字作为代号，并以隶书刊出“朗斋之印”四字，作为党、团对外或往来联络的秘码。又决定吸收党员的规定：工农份子，只要他接受宣传，有认识，工作积极，直接介绍入党；知识份子有三个月的考察期，在此期间无错误，就可以介绍入党或团。中国共产党南溪县委员会，就

这样朴素地成立了。

县委成立以后，在它的领导下，工作又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列举如下：

一、开展宣传

一九二七年六月，伪县教育局长冯哲奉上级指示：“宣传义务教育，在全县各乡镇成立‘义务教育期成会’，由县组织宣传队到各乡去宣传”。当时廖时勉、胡明鑫是教育局职员，就抓得了这项工作，以廖时勉、胡烈辉为宣传组长。廖时勉、胡明鑫、曾庆铁、胡旦元等四人为一组，走南岸乡镇，胡烈辉、熊大猷、胡明宗、王朝周等四人为一组走北岸乡镇。宣传材料除教育局印发宣传大纲外，我们还把帝国主义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贪官污吏，苛捐杂税，不合理的负担……同时宣传，以唤醒群众的思想觉悟，以激起农民群众的愤慨。这些宣传，对后来组织农民协会，在思想领域铺平了道路。

二、发展外围组织

一九二七年下学期，在南中的学生中，组织“学术研究会”作为党的外围团体。当时南溪中学校长吴小波，党对他分析是“外红内白”的投机份子，还可以利用。就以廖时勉是教育局职员的身份进行南中组织“学术研究会”，从中吸收进步学生，加入组织，并在二七年下期终，组织一次文娱活动，向外表演剧目，内容有“五卅惨案”，党人“孙炳文烈士的牺牲”……。赢得了观众的愤慨和奋起。